

天地之灵 华贵雍容 春秋早期七璜联珠组玉佩鉴赏

方琦 薛艳丽

2005至2007年,位于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的两周之际芮国贵族墓地,历经数次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多达上万件(组)玉器,其玉质之佳、雕琢之精、造型之丰、用途之广,在两周考古中实属罕见。这些玉器中既有距今五千多年的红山文化玉猪龙,又有四千多年前齐家文化的玉璧、玉琮,以及大量商周至春秋早期的作品,其年代跨度之大在我国百年考古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编号为M27、M26的芮桓公和夫人仲姜墓中各出土一件春秋早期七璜联珠组玉佩,使用年代至今已逾2800多年,色泽瑰丽,制作精湛,文化特色十足,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可谓“集天地之灵,合一组吉玉,具五德之美,现故国韶光”。

就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墓中随葬成组玉佩饰在两周时期较为流行,如山西曲沃晋侯墓地、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以及甘肃宁县石家墓地都发掘出土此类实物。这件七璜联珠组玉佩(图1)出土于梁带村M27墓主芮桓公的颈部及胸前,直达下肢部分,排列较为整齐,各玉组件基本保持下葬时的位置,复原总长度约103厘米。现收藏在韩城市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系一级文物,为芮博“十大镇馆之宝”之一。该组玉佩由一件圆形玉牌和七件自上而下,由大到小依次递减的玉璜串联而成,各璜之间又以左右各三串的玛瑙珠相互联接,最上端的圆形玉牌则以左右两串玛瑙珠与玉璜相联结,挂于颈部且达到腋下。其中玛瑙珠共有737颗,绝大多数为红色,少量为橘黄色,个别白化现象严重。值得注意的是,玉璜两侧上端的穿孔不止三个,远多于玛瑙串饰所需的穿孔数,推测其余穿孔可能是用来绑缚类似流苏的丝织品,但在墓葬中已然消失无踪。

虽然这件七璜联珠组玉佩的使用时间在春秋早期,但却没有一个组件是春秋早期的作品,皆为先前之遗留或对其稍做改制。最上端的圆形玉牌和第一件、第四件玉璜制作年代当在西周昭穆时期,第三件玉璜是商代晚期的玉龙改制而成,第二、六、七件玉璜属于西周晚期,第五件玉璜则是西周中期的作品。特别是第三件商代玉龙改制的玉璜和第四件凤鸟纹玉璜,构思巧妙,造型别具一格,雕琢工艺高超,纹饰精细流畅,给人以美的感受。

该组玉佩由上及下第三件玉璜(图2、3)系商代玉龙改制,长11.4厘米、宽2.2厘米、厚0.4厘米,豆青色玉质,局部受沁,有灰白色斑纹。玉质细腻,微透明。器身超过二分之一圆弧形,器体较厚,正、背面均留有两周旋切痕。尽管在春秋早期作为玉璜使用,但本器原为商代晚期的玉龙,头角后方和嘴部的穿孔才是原始的制作。初始制作年代为商代晚期的主要原因在于玉龙各方面的特征皆是商代晚期的典型风格。例如龙身上有数道隐而不显的同心圆,以及玉龙头尾的圆弧轮廓可延伸成为完整的璧环造型,均证明其切割于圆形玉料,符合晚商玉器分料的制式化流程。

同时,尾部的镂空工序则为钻孔后再以砑具自外向内旋削,形成外宽内窄的三角镂空,从而勾勒出龙尾勾转收尖的造型艺术,这也是晚商玉器典型的制作工艺。另外“臣”字目的制作手法,是先将龙目的外廓完成,再加上中央圆形的眼珠,这同样是商代晚期标准的玉器特征。所以说本件玉龙实为晚商的作品,龙首和龙尾共九个新的穿孔是为了作为玉璜使用而在后期所加。与之相似的玉龙在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中也曾出土。

尤为精彩的是第四件凤鸟纹玉璜(图4、5),长10.4厘米、宽2厘米、厚0.5厘米,玉质呈冰青色,器表略微有白化现象,细腻温润,半透明。左端有7个穿孔,右端则为3个穿孔。除了两端居中的穿孔为原始制作之外,其余穿孔均系后期加制。玉璜正面布满纹饰,背面无纹。纹饰为左右对称的两只高冠凤鸟,形神兼备,勾喙向外,羽尾向中央蜿蜒交缠,腹尾之间剩余面积则雕刻充满张力的足爪。左侧凤鸟羽尾自羽翅末端朝身后扬起,环绕过顶,收尖于勾喙之前,创造出回旋流物的动态感。此类头戴竖羽冠的凤鸟,身躯交缠的图案形式,皆是西周昭穆时期的典型风格。相类的构图在山西晋侯墓地M113也有出土;至于羽翅和羽尾内所填饰的羽纹零件单元,也是本时期的标准纹样。

毋庸置疑,此件凤鸟纹玉璜的初始制作年代应为西周早中之际的昭穆时期,当流传至春秋早期因应新的需要,再加上其他穿孔而作为墓主生前佩戴之用。



图2 第三件玉璜正面



图3 第三件玉璜背面



图4 第四件凤鸟纹玉璜正面



图5 第四件凤鸟纹玉璜正面拓本



图6 M27出土右手腕饰组玉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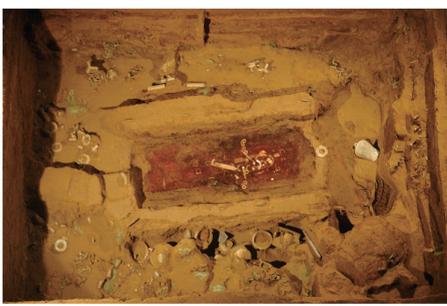


图7 M27椁室内棺撒大量朱砂

由此可知,本组玉佩乃搜集不同时代的作品重新串结而成,并对个别玉璜采用圆雕、透雕、斜刀阴刻线纹和单线阴纹、抛光打磨等雕刻技法,这说明制玉工匠掌握成熟的图案设计技术。有学者认为,改制玉器对判定器物的使用年代最为有利。只要改制,至少会有两个年代信息,即器物年代和改制年代。可以说,芮国墓地M27出土的这件七璜联珠组玉佩是前代“文物”的汇集,其珍贵程度更非寻常组玉佩可以比拟。对于探讨其时服制和礼制的特点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同时,依据这件组玉佩中的部分玉璜从商代流传至春秋早期依旧使用这一实物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可折射出周人对先前玉器比较重视,十分珍惜。史料记载,周灭商后,将缴获的包括商代玉器在内的战利品,分赏给周代宗姓诸侯和有功的大臣,芮国作为姬姓封国,拥有商周早期玉器,并用于陪葬,是合情合理的。

众所周知,周代礼乐制度以严密著称,人们衣食住行皆有章法规定。包括两周时期统治者用玉,不仅赋予其多种含义和社会功能,还根据主人地位、官级、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以至尊卑有度,规范森严,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用玉制度,并被纳入“周礼”体系,成为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考古出土文物情况来看,“以玉璜为中心的珠玉组合成为可与鼎簋相应的周代等级制度的重要标志物”。因此,周代玉璜的数量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周礼·典命》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芮桓公身为诸侯国君,为公侯一级,应为“七命”。其所陪葬青铜礼器“七鼎六簋”,七件列鼎形制纹样相同,大小相次。显而易见,“七鼎”和“七璜”都是“以七为节”,同文献记载相符,合于礼制。换句话说,“七鼎”与“七璜”也印证了当时芮国的诸侯国地位非同一般。当然,在两周时期也只有高等贵族才有能力拥有及使用多璜组玉佩,组玉佩中玉璜的数量越多,形制、纹饰越复杂,所传递出的专属属性则越突出。

《礼记·檀弓》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驪,牲用騂。”据此可知,周人崇拜红色,以致下葬要选择清晨日出、红霞满天的时间段,打仗作战要骑红色的马,祭祀用的牛马,也必须是红色的。梁带村M27芮桓公墓也是“周人尚赤”很典型的例证。该墓不仅出土了七璜联珠组玉佩,还有各种顶饰玉佩、左右手腕饰组玉佩(图6)、布棺贝玉串饰等,其间主要串结红色玛瑙珠、管,种类繁多,大小不一。据统计,仅在芮桓公墓内出土红色玛瑙珠、管共8531颗。同时,内棺施撒大量朱砂(图7),厚薄不均,最厚处达2厘米,遍及墓主整个身体和内棺底板,发掘时墓主的骨格和棺内随葬品多被染红。还在椁室随葬有多件朱底黑彩的漆木器,颜色鲜艳。

此外,对于包括七璜联珠组玉佩中737颗在内的芮国墓地两千多颗玛瑙珠、管,学界已有多篇文章对其进行相关研究。叶舒宪先生通过梳理国内外考古出土红玛瑙珠材料,认为“商代晚期在殷墟王后墓葬中昙花一现的红玛瑙珠,开启了西周统治者大量使用红玛瑙的先河,但这不是殷商人的发明创造,而是文化传播延续千年的多米诺式结果,是草原之路的重要贡献”“红玛瑙珠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国际贸易对象,它和贵金属一起,早于丝绸四五千年就在欧亚大陆上拉动了远距离的贸易活动,在催生草原之路方面堪称先锋”。事实上,周人从草原之路抑或先秦玉石之路引入的红玛瑙珠,在当时被赋予“礼”的含义,与其他珍贵玉器有机搭配,构成新的礼器组合,以一种伦理人格化的佩戴标志而成为周人巩固统治的物质载体之一。简言之,红玛瑙珠在两周时期组玉佩饰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在当时社会,类似七璜联珠这样组合繁复的玉组佩,是君子自我道德约束,举止行为规范的代表“符号”;是兼具礼仪性质的特殊性装饰品,因其尺寸较大,显然不是贵族日常生活的普通佩玉,应是朝聘周天子、行聘礼或在祭祀、礼乐等重要场合中所使用的礼仪饰品。

该件七璜联珠组玉佩因其组合关系清晰、出土位置准确、制作工艺先进,是目前陕西地区发现等级较高的周代组玉佩饰,为研究周代用玉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依据。

邵阳市博物馆藏“宝庆元宝”钱浅析

胡国海



宝庆元宝

湖南省邵阳市博物馆收藏有一枚宋代“宝庆元宝”钱,该钱为圆形外缘,轮廓周正,方形孔,直径3.3厘米,重11.3克,系铁制。钱文由楷体书写,字体俊俏挺拔,苍劲有力,正文自上而右而下而左旋读“宝庆元宝”,背文自上而下读“定三”。这枚铁钱早年由市民朱安清在文物商店中购得,后无偿赠予邵阳市博物馆,2020年7月,经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这枚铁钱对于研究邵阳的发展沿革和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宝庆元宝”为南宋理宗皇帝赵昀统治年间铸造的一类钱币。宝庆乃南宋理宗赵昀于1224年即位后,在1225至1227年间采用的第一个年号。理宗初年,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纷争激烈,除战争区域内铸行铁钱外,政府未按惯例铸造供社会流通所需的年号纪年钱,故素有“宝庆无铜币”一说。据《宋史·理宗本纪》记载:“宝庆元年七月,乙酉。诏行大宋元宝钱。”可知直至宝庆元年(1225)七月,“宝庆元宝”钱才开始流通使用,而“宝庆元宝”铸造于该诏令下达以前的宝庆元年元月至七月间,时长仅七个月。“宝庆元宝”目前仅见铁钱,一般分为小平、折二、折三三种,钱背纪年、记监或作月纹。从已有出土钱上可见小平钱背文“汉月”,为汉阳军汉阳监所铸,多行用于两淮、京西、湖北一带;折二钱背文“定二”,折三钱背文“定三”“惠三”“惠正三”等,定指嘉州丰远监,惠指邛州惠民监,均位于四川路一带。“宝庆元宝”因铸造发行时间短,故存世数量不多,如张崇懿《钱志新编》卷十一载:“(铁钱)又有仍以宝庆元宝为文者,绝少。”邵阳市博物馆藏“宝庆元宝”钱应为少有流传的珍稀之品。

湖南博物院使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这枚“宝庆元宝”钱进行了科技检测,由检测分析结果可知,除铁元素以外,其他元素的含量均未超过1%。根据学术界惯例,2%可作为金属材质的判断界限,由此可知,这枚“宝庆元宝”钱应为纯铁材质。

铁钱是中国钱币史上一类特殊的金属钱币。东周时期

以来,中国进入铁器时代,铁也逐渐成为中国历代政府生产制作各类兵器、工具、货币的主要原料。铁钱在两汉至明清时期均有铸造和行用,但铁钱作为政府正式铸造发行的官方货币仅在两宋时期,在中国历代铁钱中也以两宋铁钱种类最繁、数量最多。在两宋三百多年间,中央政府虽然对铁钱的铸造场所、发行数量和流通范围等环节进行了规范和限制,但由于铁钱铸造成本低、铜料供给不足以及五代十国以来遗留币制等原因,导致铁钱的生产铸造活动长期存在,而铁钱的规模化生产既能解决宋代商品市场中流通货币不足的问题,也能有效防止铜钱向西夏、辽、金等外流的现象,因此两宋政府更是专门设立“铁钱监”,用以铸造和管理铁钱。据相关统计,两宋时期有大量的铸币机构在不同时期生产铁钱(即恩达《宋代的铁钱监和铁钱》,中国钱币,1988年)。此外,两宋时期的铁钱生产亦有区别,南宋铁钱的铸造数量和行用地域相较于北宋铁钱进一步增加和扩大。北宋钱币以铜钱为主,铁钱次之,且铁钱主要流通于川陕等地;南宋钱币则以铁钱为主,铜钱次之,且铁钱主要流通于川蜀、京西、江

淮诸地(高英民《中国古代钱币》,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综上所述,中国古代铁钱的铸造生产和行用规模在两宋时期迎来了高峰,两宋时期的铁钱生产也具有持续时间长、铸造用量大、行用地域广的特点。宝庆元宝作为南宋理宗元年发行的货币,是两宋铁钱的重要代表,其材质特征和生产规模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关系密切。

邵阳位于湖南省西南部,资水中上游,地理位置特殊,历史文化悠久。邵阳在春秋战国时期先后为古越族群和楚国所据。秦汉时期,邵阳逐渐纳入中原政权的统治疆域范围内,为中央政府统一管辖。自邵阳作为历代政区以来,先后有昭陵、昭阳、邵阳、建州、南梁州、邵州、敏州、敏县、宝庆等称谓,其中以宝庆之称谓最为人们熟知,亦沿用时间最长,近700余年,历经南宋、元、明、清等朝代,直至民国十七年复称邵阳(谢国园《邵阳城变迁研究》,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如前文所述,宝庆乃南宋理宗赵昀即位后采用的第一个年号,有喜庆之意,据《宋史·理宗本纪》记:宝庆元年(1225),曾任邵州防御使的南宋理宗赵昀继承皇位后,为纪念邵州曾是自己的分封之地,“诏邵州藩藩可升为宝庆府”,以年号名。南宋理宗皇帝专门以自己登基后的第一个年号“宝庆”来命名邵州,并将邵州破格升为宝庆府,可见其将古代邵阳视为风水宝地。而“宝庆元宝”作为宝庆元年短时间内集中铸造而成的发行货币,现存数量稀少,因而具有重要的钱币学和历史学价值。

宝庆府以地名的形式使南宋理宗的第一个年号得以传承,在这700年里,宝庆人民扬长补短、兼容并蓄、重商助学,以开放积极的心态、顽强拼搏的精神融入世界,赢得了“铁打的宝庆”的称号。

邵阳市博物馆珍藏的这件“宝庆元宝”钱,不仅是宋代钱币制造活动中的特殊产品,更是邵阳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关键见证。

百学穷其源

新见沈曾植信函

程存洁



粤籍学人罗原觉(1891—1965)私人信件中,存有一封信函,后由其女罗德慈捐赠给广州博物馆。该函一页,横10.6厘米,纵20.1厘米,从右往左毛笔竖写,共3行文字,因内容过于简单,其学术价值长期被淹没。笔者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级研究员王杰的帮助下,试释信函内容如下:

题件二、书件三,藉使缀/呈,复请/原觉仁兄刻安。寐叟。信中所提“原觉仁兄”是指广东著名文物鉴藏家兼学者罗原觉,“寐叟”即沈曾植(1850—1922)。可知这是沈曾植写给罗原觉的一封信函。

沈曾植,“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生。1880年庚辰科进士。历任清政府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居刑部十八年,专研古今律令书。寻充总理衙门章京。1898年两湖总督张之洞,聘为两湖书院讲席。旋入京,调外交部,授江西广信知府。历署督粮道、盐法道,擢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察学务。1908年2月,署理安徽布政使,寻代理巡抚。在皖5年,又兴实业,办造纸厂等。1910年病归,在上海与郑孝胥、姚文藻等组织宗社党。1911年武昌起义后,定居上海。1917年7月,参与张勋复辟,被任为“学部尚书”,失败后,闲居上海。1922年11月病逝。著有《汉律辑补》《晋书刑法志补》《海日楼文集》等。”(徐友圭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第433—43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沈曾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之名蜚声海内外,辞世后,康有为于1923年著《哭寐叟四兄尚书哀词》,高度颂扬沈曾植具有“百学穷其源,九流揽其别”的学术精神(马洪林、卢正言编注《康有为集·诗赋卷(下册)》,第796页,珠海出版社,2006年),认为“论全浙人才,道德学问文章志节,亦莫如沈培老及黄先生(笔者按:指黄仲弼)也。此诚中国人之楷模,非只游士之特达也。”(《康有为集·书信卷·致夏定侯书(一九二二年)》,第598页,珠海出版社,2006年)这位“博闻而强记,钟扣必应节”(上述引文第796页)的学术大儒,其言行,备受学人关注。

上述这封信函既无年款,又未对信函中所提“题件二、书件三”等作出任何说明。根据相关材料,我们推测,信函中所提“题件二”是指沈曾植对罗原觉藏古物题写鉴赏题跋一事。

据王中秀编著《黄宾虹年谱》介绍,1921年3月罗原觉从北平到沪,造访当地学人,黄宾虹为罗藏《李思训碑》拓本题跋:“北海李思训碑,近今流传海内者,神采飞动,毡藉拓本,宋拓佳本似无逾此。原觉罗君,幼学嗜古,复能较其存字之多,一一为之详考,可称物得其主,筠清诸馆不获专美于前矣,志之以誇福。辛酉三月,宾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版)该年谱进一步提及:“碑帖尚有王国维、朱祖谋、沈曾植等题跋,显为黄宾虹所介绍。碑帖由有正书局出版。”可知,罗原觉此次访沪,不仅携带李思训碑拓,通过黄宾虹,结识了王国维、朱祖谋、沈曾植等学人,还请他们为该碑拓题跋。沈曾植所写题跋,即是上述信函中所提“题件二”中的一件。

《黄宾虹年谱》又引《黄节致黄宾虹书》云:“宾猷先生,奉手书并赐画,甚感。前次之晋交来画一联五,均收领,已代送一幅与敷庵矣……原觉已回粤否?草草呈拙诗一纸乞教正,不尽,并向起居。弟节顿首。三月廿七日。”按辛酉年三月二十七日即1921年5月4日。年谱中引用的另一封《黄节致黄宾虹书》:“宾猷先生:日前寄寄拙诗,想经览,就难起居万福至慰。闻罗君原觉尚未回粤,想有过从……弟节顿首。四月十三日。”按农历四月十三日即1921年5月20日。据此可知罗原觉是次访沪,时间长达数月。

另据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7春季拍卖会公布“黄庭坚书苏东坡马券后赠李方叔真迹卷”绢本手卷,手卷上有张大千、汪迟云、梁启超、罗仲曼、罗振玉、黄节、罗惇融、汪大燮、陈衡恪、徐乃昌、狄保贤、姚华、黄宾虹、王国维、沈曾植、朱祖谋、郑孝胥、王秉恩、马寿华、王世杰、丁治盘、王闾善、王己千、林近平等学人书写的题跋。其中,辛酉年(1921)正月顺德罗惇融题跋内容是:“吾宗原觉藏此有年,携至京师,展芬怡悦,忻赏竟日。”黄宾虹的题跋内容是:“原觉罗君筐中宝此,宜善藏之。”可知该绢本手卷原为罗原觉藏品,罗于1921年携此宝物北上天津、北京、上海等地,供名家鉴赏。

在这批名家题跋中,沈曾植的题跋内容是:“宋人言德寿学黄书。黄书石墨满人间,德寿书流传亦不渺,何曾少分交涉?此语大是。书家清议公案。今观此卷,居然见德寿抽锋所自来,体变而笔固未变也。吾甚病明世以来告以战掣横放山谷,遂使山谷与二王隔绝,山谷集有自评元佑间书一册。善鉴者味之。辛酉上巳后三日寐叟观记。”按“上巳”即我国传统节日农历三月三日。此时罗原觉正携此宝物在上海。据此可知沈曾植的这则题跋当写于上海。在这件题跋上,沈曾植盖有“海日楼”和“俭斋”两方篆体印文。可知沈曾植题写的这份题跋,也应是上述信函所提“题件二”中的一件。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沈曾植书写的这封信函写于1921年农历三月。此时,沈曾植71岁,罗原觉30岁。该信函是写在“静俭斋”信笺上,“静俭斋”是沈曾植嗣子沈慈护(1898—1963)的斋号。

沈曾植与广东的因缘较早。早在1877至1878年,他住在广东有近一年时间。据《海日楼题跋·王禹卿秋日登文游台诗卷跋》记录:“延恩堂中藏书五万卷,而书画金石特稀。兵燹后,坟墓所存,收拾入粤者,亦仅书籍百一耳。丁丑游粤,省觐叔父,偶见败篋度室隅,因与六弟发之,乃得此卷,乃金辅之手书长卷。”沈曾植在《家传稿》中也曾提及此事:“光绪丁丑,曾植在粤,于旧篋中得抄本金函卷一册、竹垞五言律诗一册,持呈叔父连州公。”按叔父即沈宗济。《海日楼题跋·文选各家诗集跋》记载:“蜀中近日刻书甚夥,然颇少持择,犹不逮粤、江、浙无论也。薄游羊城,偶思读《文选》诗,适见此书,遂购之,聊取轻便,利行篋而已,其书固不足存。”

沈曾植致罗原觉函的发现,为人们进一步了解沈曾植与广东的关系及与粤籍学人间的学术交往,添加了一份崭新而生动的资料。